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70

李贽

陈洪著
◎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0

李贽

陈洪著 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贽/陈洪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 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2025-8

I. 李… II. 陈… III. ①古典文学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明代②李贽 (1527~1602)—文学评论 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786 号

李 贽

陈 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8 千字 印张: 3 $\frac{3}{4}$ 插页: 2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王 颖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025-8/I·1763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目 录

引 言/1

一、堕落与生机并存的时代/4

二、铜枝铁干 霜雪一生/10

三、自我放逐于“异端”/26

四、张扬“童心” 鼓吹“发愤”/36

五、“《水浒传》批点得甚快活人”/48

六、慧心解稗理/70

七、我手写我心/96

八、化身百千亿/102

引言

明末清初的百余年,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。明初以来长期笼罩文坛的沉闷空气被劲风吹散,一时间,群星璀璨,佳作泉涌,文学的天地间充溢着勃勃生机。以作家论,最先走入我们视野的是“人奇文亦奇”的徐文长,踵其武者为力倡“情可使人生死”的汤显祖、慨叹“胸中磨损斩邪刀”的吴承恩,随后便有兰陵笑笑生、三袁兄弟、钟谭之辈、冯梦龙、凌濛初、李渔、李玉、钱谦益、吴梅村、张岱、董说、金圣叹、丁耀亢、陈忱、蒲松龄等,相继飞腾而入。以作品论,《四声猿》、《歌代啸》、《西游记》、“临川四梦”、《金瓶梅》、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、《西游补》、《续金瓶梅》、《醒世姻缘传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后七律》组诗、《圆圆曲》等,俱堪传世而不朽。以理论批评言,《曲律》、《五才子书》、《六才子书》、《闲情偶寄》、《姜斋诗话》、《原诗》等,皆足彪炳于史册。

对于这个文学史上的辉煌时代,人们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概括其精神,有的称之为“浪漫时代”,有的称之为“启蒙时代”,也有人认为二者皆



李贽画像(藏中国历史博物馆)

不够恰当,而代之以“狂放时代”。虽然在具体描述上众说纷纭,但研究者们的最基本看法却是一致的,就是: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,这是一个张扬自我的时代,这是一个肯定情欲的时代,这是

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……而作为这个时代的旗手与先行者,则只有一个人可以当之无愧。他,就是李贽——李卓吾。

一、堕落与生机并存的时代

李卓吾生于嘉靖，卒于万历，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了七十多个春秋。这七十余年，是明代转入衰败的阶段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大转折之关键点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，这一阶段可看作中华民族兴衰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（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）。李卓吾的生命之歌正是谱写在如此不寻常的大背景之下，而这一首高亢、激烈的狂歌又为这大背景增添了惊心夺目的光彩。

这是堕落与生机并存的时代。

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，如正德、嘉靖、万历、天启，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。正德帝朱厚照溺于嬉游淫乐，先宠权阉刘瑾，后嬖钱宁、江彬，独出心裁地封自己为“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”，以便随心所欲地南巡北狩。他所到之处，纵容群小劫掠民女，恣意淫乐，以至“四民告病，哀痛之声，上彻苍穹，传播四方，人心震动”（《明史·舒芬传》）。群臣劝谏，他竟将一百四十余名大臣上了刑具罚跪五日，然后廷杖于朝堂，当场毙命者十二人。史家称其“昏狂无道，

方古齐东昏、隋炀帝之流，并无逊色”（孟森《明清史讲义》）。嘉靖帝朱厚熜则与之相反，喜静厌动，一心崇奉道教以求长生。《西游记》中所写迷信妖道而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、残害无辜僧众的灭法国王、车迟国王等，都有他的影子。嘉靖中后期的三十余年，他大半时间同道士厮混，朝政交给严嵩之流，搞得是非颠倒，国困民穷，到了“嘉靖嘉靖，家家皆净”的地步。万历帝朱翊钧十岁即位，当朝四十八年，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政、不行祀典，却在二十一岁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，历时六年，役使军民六千余万人次，耗银八百余万两。他为皇子办一次婚礼便动用国库银二千四百万两。如此穷奢极欲，当然靠的是横征暴敛，《神宗实录》记载当时的情况是：“穷天夺产，罄地伐毛”，“民力凋敝，十倍于旧”。

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，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。正、嘉、万的百年间，并非没有精干有识的人物。政治家如张居正，思想家如王阳明，军事家如戚继光等，都是彪炳千古的奇才，亦曾跻身枢要；而朝野士人的普遍抨击时弊，甚至一再冒死极谏（张英肉袒戟刃上表，海瑞买棺而后草奏），也是史不多见的。但是，无奈积弊如山而君昏如故，这些都改变不了明王朝政局颓败的大趋势。

李卓吾于嘉靖三十五年出仕。此时的明王朝好似一座百年大厦，墙欲倾，柱将朽，而在地基

上、墙缝中，却又茁生出大量藤条草木。它们飞快地生长，枝叶繁茂，一片新绿。由于它们的撕扯，大厦的罅隙更多更宽了。虽然大厦的崩解也将给它们带来厄运，但它们仍自顾生长着——这就是新的商品经济成分、与其相伴生的市民文化，以及带有异端倾向的思想流派。

《醒世恒言》中有一则常为经济史学家称引的故事：苏州盛泽镇“丝绸牙行，约有千百余家。远近村坊织成绸匹，俱到此上市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，蜂攒蚁集，挨挤不开，路途无驻足之隙”。可见商品经济的繁荣。小说的主人公施复“是个小户儿，本钱少，织得三四匹，便去市上出脱。……几年间，就增上三四张绸机，家中颇饶裕。……省吃俭用，昼夜营运，不上十年，就长有数千金家事，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，开起三四十张绸机，又讨几房家人小厮，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”。这虽属稗官家言，却极为典型地描述出明后期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情况。对此，明人笔记多可印证。如张瀚的《松窗梦语》：“余尝总览市利，大都东南之利，莫大于罗绮绢纴，而三吴为最。即余先世，亦以机杼起。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。”他所记述其祖上的发家情况与施复的故事颇相似，也是“（一张织机）获利当五之一，积两旬，复增一机，后增至二十余……家业大饶”。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则提到了全面的情况：“正德以前，百姓十一在

官，十九在田，逐末之人尚少。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，三倍于前矣。”史籍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，如《神宗实录》：“吴民生齿最繁，恒产绝少，家杼轴而户纂组，机户出资，机工出力，相依为命久矣。”

工商业的发展迅速改变了社会结构与社会风气。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这样描述道：“嘉靖末、隆庆间，则尤异矣。末富居多，本富益少。……迄今三十余年则迥异矣。富者百人而一，贫者十人而九，……金令司天，钱神卓地，贪婪罔极，骨肉相残。”这是贫富分化的情形以及连带而生的人际关系、社会风气变化。据明人笔记，成化年间的民风还是相对淳朴、相对本分的，而嘉靖以后便日趋奢靡，并置封建等级制度于不顾，在器用服饰上肆意“僭越”。《吴江县志》也有这方面的记载：“至嘉靖中，庶人之妻多用命服，富民之室亦缀兽头。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。”

对于这种经济、社会现象如何评价解释，史学界歧说纷纭，不过基本事实是确凿无疑的：新的生产方式、流通方式正在孳生发展，新的社会阶层正在逐渐形成。

与市民阶层的勃兴同步，王学在思想界迅速扩大影响，占据了主流位置。

明初的百年间，程朱之学是钦定的官方哲学，在八股考试制度的配合下，牢牢控制着士人的思想。到了正德、嘉靖之际，这种思想界的大一统局

面开始被打破。王阳明公开批判程朱,以“心学”与之抗衡。阳明之学的核心是“良知”说,即以个人的“良知”替代高高在上的“天理”而成为道德的根源,成为一切社会价值的赋予者:

“我”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。天没有“我”的灵明,谁去仰他高?地没有“我”的灵明,谁去俯他深?鬼神没有“我”的灵明,谁去辨他吉凶灾祥?

由此出发,他力主做人应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,而不能拘泥于典训,拜倒于偶像脚下。因而,王阳明公然以“狂者”自诩:

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,信手行去,更不着些覆藏。我今才作得个狂者的胸次,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!

这种人生态度表现于治学,便是向权威性成说挑战。王阳明借鉴佛学禅理,对儒学的很多命题作出新的解释,如指《大学》中“在新民”为“在亲民”之误,并进一步释“亲民”:

亲民者,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。……是故亲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,亲吾之母以及天下人之母。……君臣也,夫妇也,

朋友也，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，莫不實有以親之，以達吾一體之仁。

这段话曾被论敌指责为墨家“兼爱”邪说的翻版，可见其与传统儒学的差别。

从本质上看，王学并未超出封建思想的藩篱，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更无可置疑。不过，上述张扬自我、蔑弃权威以及相对社会平等的主张，既有市民意识的间接反映，也在客观上与新兴的市民意识相互呼应。而阳明的继承人在愈来愈浓烈的市民意识影响下，进一步加强、发挥这些观点，“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”（黄宗羲《明儒学案·泰州学案序》）。

嘉靖三十二年，首相徐阶、兵部尚书聂豹、礼部尚书欧阳德等，在京城召开讲学大会，鼓吹王学，与会者五千多人，“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”。这标志着王学已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。当然，在发展的同时，王学也经历着分化。而向着“异端”、“离心”方向走得最远的，是龙溪学派与泰州学派。前者在张扬自我方面更为突出，后者则与下层民众关系密切。李卓吾于嘉靖三十一年中举，开始踏上仕途。而影响其一生的人物中，王龙溪与泰州学派的何心隐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位。

二、铜枝铁干 霜雪一生

李卓吾是一位极富批判性的思想家,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;同时,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家,他的论文之作及小说、戏曲批评风靡于一时,对晚明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然而,在历史上,对他的评价颇多争议。虽然不乏汤显祖与袁宏道那样的崇拜者,但多数论者却持否定态度,甚至如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博雅通达之士亦有微辞。究其原因,一则卓吾之思想悖于正统而又锋芒毕露,二则卓吾之性格异于常人而又倔强难驯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李卓吾的生前遭际与身后毁誉,皆拜此二端之赐。

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。”《红楼梦》中的这两句诗移用来形容李卓吾的大半生,虽未必尽合,但也相去不远。而霜欺雪压之下,李卓吾却如同根扎九泉的老树,傲然于广漠之野,把它的铜枝铁干刺向漫天的阴霾。

李卓吾,原名林载贽,后更名李贽,号卓吾,又号宏父、思斋居士、温陵居士、龙湖叟、秃翁等,福建泉州人,生于嘉靖六年(1527),卒于万历三十年



三教图 明 丁云鹏

(1602)。泉州是重要的通商口岸，李卓吾的祖先颇多经商者，如其二世祖李驾，曾在明初“奉命发舶西洋，娶色目人，遂习其俗”。家族中宗教信仰亦很复杂，伊斯兰教、佛教、道教都有虔诚信徒，而儒学也有影响。这使其家族传统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华夏的主流文化。李卓吾的祖父辈似已家道中落，到卓吾的父亲便以教书为业，但仍保留着其祖上的豪放之风。

李卓吾童年丧母，随父亲读书，先后习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，性情颖悟，十二岁便在习作《老农老圃论》中对《论语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随着年齿渐长，独立思考与大胆批判的精神也逐渐增强。他自称幼时已“不信道，不信仙释”，而“稍长，复愤愤，读传注不省，不能契朱夫子深心”，对理学也开始怀疑，甚至产生了“欲弃置不事”的念头。后来，他以“此直戏耳”的态度对待八股文与科举考试，竟在二十六岁轻易中举。他当即宣称“吾此幸不可再饶也”，就此退出了科考。三十岁，李卓吾出任河南共城教谕，后历任南京国子监博士、礼部司务等微职。这期间，家多变故，卓吾的父、祖及三个子女先后去世，使其精神受到了沉重打击，在《卓吾论略》中，他发出“嗟嗟！人生岂不苦？谁谓仕宦乐？仕宦若居士，不乃更苦耶”的叹息。隆庆五年，卓吾调南京刑部员外郎，万历五年，任云南姚安知府，在任三年挂冠而去。

李卓吾性格倔强，向往精神自由，故自入泮至

挂冠，“以不受管束之故，受尽磨难，一生坎坷，将大地为墨，难尽写也”。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仕途经历，感慨万端：“为县博士，即与县令、提学触；为太学博士，即与祭酒、司业触；……司礼曹务，即与高尚书、殷尚书、王侍郎、万侍郎尽触也。……最苦者，为员外郎，不得尚书谢、大理卿董并注意。……又最苦而遇尚书赵，赵于道学有名，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？最后为郡守，即与巡抚王触，与守道骆触。”这既有官场黑暗、世风虚伪之“皆浊独清”的原因，也与卓吾自身的性格缺欠有关。而这样的经历，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社会批判精神，也强化了他桀骜狂放的个性。

二十余年的宦游生涯，就仕进而言，卓吾是失败者；而就求索、证道言，他却收益颇丰。入京补礼部司务时，人或以“司务之穷”告之，卓吾答曰：“吾所谓穷，非世穷也。穷莫穷于不闻道……吾闻京师人士所都，盖将访而学焉。”他回忆在任礼部时的生活：“五载春官，潜心道妙。”这指的是他对王学的体认。李卓吾在《阳明先生年谱后语》中具体记叙了他接触王学的经过：

……为友人李逢阳、徐用检所诱，告我龙溪先生语，示我阳明王先生书，乃知得道真人不死，实与真佛、真仙同。虽倔强，不得不信之矣。